



塔其

提高畜牧業效率

當一個國家的國民所得繼續不斷上昇時，其人民的生活品質必然隨之漸次改善，這種改善表現在食品消費上的，就是以多食用肉類和乳類品的間接消費來代替穀物的直接消費。布里茲涅夫於今年五月在俄共中央全會上提出的「國家糧食計劃」中，強調要特別注意畜牧業的發展，即是要盡力彌補畜牧產品在供應與需求上的差距。由於畜牧產品的減少，在蘇聯已有許多地方發生了「食無肉」的現象，布里茲涅夫也不得不承認，食品 and 肉類的短缺已成了蘇聯「最緊迫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七月十九日「真理報」上刊出一篇題為「提高畜牧業效率」的社論。文中指出，在過去的三個五年計劃裏，肉類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牛奶百分之二十五，蛋類幾達二倍。而計劃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將肉類生產增至十七至十七·五百萬噸，牛奶增至九七—九百九十九萬噸，蛋類增至七八—七九百萬個；而要達到這個目標，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生產效率。雖然在報紙上提出的數字似乎仍非常樂觀，但實際上在一九八一年的肉類產量只達到一千五百二十萬噸，奶製品、雞蛋等亦有不足的現象，因此據報導，今年蘇聯的肉類進口可能達到破紀錄的百萬噸。蘇聯報刊亦曾透露，今年一至十月俄羅斯聯邦等八個加盟共和國出現牲畜頭數減少，特別是豬的數目銳減的情況，全蘇聯的牛奶產量亦減少了百分之三。八月十三日的「真理報」又登出一篇文章，指責蘇聯的農業產量未能達成目標，在肉類、乳類和家禽生產上有嚴重的減產現象。向來只描述經濟光明遠景的蘇聯官方報紙上，出現這種批判，可見其實際情形的嚴重。

蘇聯在畜牧產品上的短缺，主要是因為飼料不足。在蘇聯，欲增產一噸肉類，必須使用八噸穀物飼料，因而欲增產兩百萬噸的肉類（如此，才達到五年計劃的生產目標）和其它奶製品、蛋類，則約需增加兩千萬噸的穀物飼料，而在穀物收成不增反減的情況下，只有仰賴國外進口，這對本已困窘的蘇聯財政，是一沉重負擔。除了進口外，蘇聯政府亦以鼓勵人民提高生產效率作為對策，但在食品供應欠缺情況下，又如何激勵人民去賣力工作？而體制上的弊端，又常使農民在生產上缺乏積極性，並造成嚴重的浪費。因此，就畜牧生產而言，除非蘇聯本身的穀物收成情形良好，並在制度上作適度的改善，否則，要想突破生產的困境，又談何容易。

蘇、波共領導人會晤

波蘭黨、政、軍領導人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於八月十六日在黑海邊的克里米亞與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作一短暫的會晤。會晤中，賈魯塞斯基向布魯敘述了波蘭現況，指出「波蘭緊急情況的繼續存在是因存在着由外來勢力、特別是美國、所鼓勵與支持的反革命的

地下活動」，但他向布魯保證，波蘭社會顯現的和平與愛國的責任意識將會克服在恢復秩序上所遭遇的任何困難。這是賈魯塞斯基在去年十二月宣布戒嚴令後的第二次造訪蘇聯。

賈魯塞斯基甫於上個月（七月）在波蘭進行了一次黨、政高階人士的改組。在這次的改組中，他提升了數名經濟學家的職務，包括將波蘭主要經濟週刊的總編輯葛羅齊克（Jan Glowczyński）和波共高級黨校經濟學系主任高瑞沃達（Marian Głowacki）兩人任命為波共中央書記。這種重用經濟學家的政策，顯示出波蘭的經濟狀況仍然惡劣，且急需作有效的改善。除了經濟問題外，政治上，「團結工聯」在去年底雖然遭到全面性的鎮壓，但它的影響力仍然存在，可以說，團結工聯仍是波蘭局勢發展的一個關鍵性影響因素。波共報紙在八月三日曾猛烈抨擊團結工聯，認為其未曾在軍事鎮壓中得到任何教訓。這種抨擊否定了最近有關波蘭可能取消戒嚴令的傳說（因為賈魯塞斯基的軍事政權已在上個月對戒嚴法措施做了若干程度的放寬，且還釋放了一些政治犯，而引起他可能取消戒嚴令的臆測）。這種經濟、政治問題使得賈魯塞斯基在繼今年三月的訪問蘇聯後，短短的半年間，又做出第二次的訪問。

然賈魯塞斯基的會晤布里茲涅夫還受到另一個因素的促成，誠如「塔斯社」指出，此次的會晤是一次短暫、「工作性質」的訪問。因此這次的訪問就性質而言，與七月三十日捷共總書記胡沙克（Gustav Husák）、八月十一日東德共黨總書記洪內克（Erich Honecker）的造訪克里米亞並無多大差別。每年七、八月，布里茲涅夫都會趁其在克里米亞所謂渡假之時，接見東歐集團的共黨頭子，聽取他們的「報告」，並彼此交換意見，這是一項政治傳統。然今年似有一點小差別，那就是八月即將終了，而大多數的共黨頭子仍未前往「晉見」，是否意味着布魯健康已不勝負荷，無法接待這麼多的共黨頭子，還是另有其它原因，這就值得玩味了。

蘇聯的中東政策

七月廿一日「真理報」上，刊出了一篇布里茲涅夫答覆該報有關「黎巴嫩問題」的訪問文章

。布魯在受訪時指出，他支持派遣一支聯合國部隊監督被困的巴解撤出西貝魯特的建議，但堅決反對美國派兵參加該部隊。他並首次向美國反應其對以色列侵入黎巴嫩一事的憤怒，聲稱美國應對以色列的侵略行為負責。這是繼七月上旬布魯致電雷根總統，提出警告後的再次表態。然布魯的書面或口頭警告、抗議能否在實質上舒解巴游的燃眉之急，却不無疑問。

中東目前除了黎南問題外，還存在着兩伊戰爭的危機。由於中東國家是世界石油主要輸出國，波斯灣又是戰略要地，這些都影響美、蘇對此地局勢的關切。蘇聯深知其勢力的直接伸入中東地區必然會導致美國的正面對抗，因此其對波斯灣國家祇是刻意交好，並施以恫嚇，使它們在美、蘇間維持一種中立的地位。而對兩伊戰爭，蘇聯則是抱着不讓交戰雙方的任何一方獲得絕對勝利的態度，因為這種結果不符合蘇聯的利益。另一方面，在今年五、六月間不斷有中東國家的領袖或代表團往訪莫斯科，其中包括約旦胡笙國王（King Hussein）、利比亞領袖格達費上校的一名高級助理——賈路德（Abdel Salam Jalloud）、及前往促使蘇聯干預黎巴嫩事件的阿拉伯聯盟部長級特遣團（Arab League ministerial mission），都未獲布里茲涅夫的接見；一些蘇聯報紙也批評「一些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侵略行為顯得無動於衷，或完全癱瘓」；敘利亞總統阿塞德曾於七月廿日左右秘密前往莫斯科，他的目的顯然是要把一九八〇年十月雙方簽訂的二十年「友好條約」提升為「戰略合作協定」，但蘇聯亦未做出最後決定；凡此都顯示出蘇聯在目前並無意強力介入中東問題。

蘇聯對中東的野心是毫無疑問的。早在帝俄時代，彼得大帝曾高呼過：要把裏海變為俄羅斯的內湖，要據波斯灣為己有。而今，中東正值多事之秋，恰可給蘇聯一個介入的機會，然蘇聯的反應何以是如此的消極與低姿態？探究其原因，約有下列幾點：(1)中東國家除了極少數極端派外，多數是反共的，他們深懼蘇聯勢力過份的深入波斯灣；蘇聯也明白這一點，因此它不願做得太過火，免得收到反效果；(2)蘇聯對過去埃及兩位總統納瑟與沙達特的反蘇教訓記憶猶新，而變得深具警戒；若它全力支援巴游，而在未來事成之後，巴游及阿拉伯國家是否會對蘇聯感激涕零，仍不無疑問，所以它無需冒着與美國直接衝突的危險，去做那不見得符合蘇聯利益的事；(3)最近一年美、蘇的爭奪已重新回到歐洲，如核武的部署、通往西歐的西伯利亞天然氣管道的敷設。蘇聯在中東問題上擺出一個「緩和」的和平低姿態，可爭取搞好與歐洲的關係，以便在主戰場上壓倒美國。

克宮人事異動

已被解除其現時職位，調任駐古巴大使。

卡圖雪夫生於一九二七年，一九五七年開始在高爾基城擔任黨務工作。一九六三—六八年歷任市黨委員會第一書記及省黨委員會第一書記，從而奠定其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九六八年受到布里茲涅夫的賞識與提拔而出任俄共中央書記，一九七二年並兼任俄共中央社會主義國家共黨部部長，負責蘇聯與其它共黨國家共黨的聯繫工作。[一九七七年調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任駐經互會常任主席。他一直被認為是布魯的親信。

現年五十四歲的卡圖雪夫曾一度被暗示為可能接替布里茲涅夫職位的人選之一，這次他的調職有二個可能原因：(1)因某些未透露的理由而被降職；(2)蘇聯欲加強與古巴之關係。這是二個互不關連的因素，而吾人猜測以第一個原因的可能性較大。若就政治權力鬭爭的角度觀察，卡圖雪夫顯然是遭受某種程度的貶抑，因為駐外大使是一種與權位爭奪扯不上關係的職位，因此，他的外放可使一些覬覦布魯職位的人少去一個可能的競爭對手。

蘇聯式的和平運動

口號的所謂「八二年和平行軍」運動。這個運動是由參與人士沿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莫斯科——明斯克路線行軍。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運動的行軍路線上包括了兩個蘇聯城市——莫斯科或支助此一活動，由於莫斯科、明斯克出現這種羣衆運動，不可避免地會令人聯想起另一個問題：蘇聯是否放寬了其對羣衆運動的限制？

早在今年六月十一日，一個由藝術家 and 知識份子組成的「和平委員會」，因其主張美、蘇人民應更深入參與現在僅由政治家壟斷的限武談判，並主張「生存」問題不應僅是用來作為政府間關係的討論，而遭到KGB的整肅；另據西德的「國際人權協會」於八月二十一日稱，蘇聯和平運動的領袖之一——畫家巴托夫林(Sergei Batovrin)於八月六日遭逮捕，並被送進一家精神病院。而另一方面，在東歐集團中有一個世界和平會議，主席為印度共產黨員相得拉(Romech Chandra)，此一會議由克里姆林宮直接、巧妙地操縱，它只對美國的政策加以批評，至於蘇聯的入侵阿富汗或其它違反人權的事實，這些和平人士則從未予置評。

由此可見，蘇聯對和平運動的態度是一分為二的。在國內，「它不准任何反對蘇維埃意識型態或克里姆林宮政治目標的活動出現，在國外它又大力鼓吹、贊助對蘇聯有利的羣衆示威運動。因此，若非蘇聯認為這個「八二年和平行軍」運動有利於它自身，蘇聯諒也不會允許這個運動進入自己的國

境了。

改善經濟教育與勞動者的培養

文內指出，蘇共中央委員會與蘇聯部長會議於今年六月通過的決議案「關於進一步改善經濟教育與勞動者培養」，即是要提高此二項目在經濟轉化向集約化途徑及完成蘇聯「糧食計劃」上所扮演的角色。在議決案中，要求保持經濟教育的高學術水準，在學習理論與經濟政策時，必須注意與現實生活間保有緊密的聯繫；教育方式必須更專注於充分利用發達社會主義的條件，並訓練勞動者有效地參與生產和管理。學校學員在提高生產效率與加速科技、技術發展上應該有所專精，並積極參與生產管理。

此篇文章的要點乃在於如何有效應用物質與勞力資源，這也是蘇聯經濟發展上最需要突破的難題。據「莫斯科廣播電臺」去年九月二十日的一項報導稱，蘇聯經濟在這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將在勞動力增長速度緩慢的情況下發展，有勞動能力的人數將祇增加三百多萬人，是過去五年的三分之一，因此計劃上規定的工農業產量的穩定成長，將依靠企業的現代化來達成。另一方面，蘇聯稱其擁有七千多所職業技術學校，專門為工農業培養熟練的技工。雖然在企業現代化及技工的培養上，蘇聯投下大量的心血，作長遠的投資、規劃，然在七月廿四日「真理報」上公布的今年前半年的經濟生產上，蘇聯經濟依然呈現停滯狀態。在前半年的經濟成長統計中，工業增長率為百分之二點七，遠低於今年指標的百分之四點七；勞工生產力增加百分之二，而指標則為百分之四點一。這種情形的產生，蘇聯人民之下不願盡心盡力於工作上，恐怕要佔很大的比重。在勞動力增加緩慢的情形下，政府也只好不斷呼籲改善經濟教育的品質及好好地培養蘇聯式標準勞動者，以免因人力不足的因素影響及經濟發展的整個大局。

第一屆全蘇生物物理代表大會

八月三日蘇聯召開第一屆全蘇生物物理代表大會。是日，蘇聯部長會議致電慶賀，稱贊生物物理學近幾年來在基礎和應用研究上的非凡成就，並言，生物物理學家應使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為愛好和平的力量在防止核戰的威脅上盡力。

大會組織委員會主席伊凡尼茨奇（K. Ivanitski）在會上就生物物理學的發展及應用作一報告。在他的報告中指出，蘇聯生物物理學會於一九一九年創立於莫斯科，一次大戰後，物理和化學的急速發展亦帶動了生物物理學的快速發展，一九五二年在蘇聯科學院內成立了生物物理學研究所，而西伯利亞生物物理學研究所則於一九八〇年成立。伊凡尼茨奇亦指出，蘇聯生物物理學被廣泛地實際應用在醫學、農業、工業和環境保護上，一些這方面的專家亦活躍在國際生物物理學界上。此次與會的學者專家超過一千人以上。